

卢文弨《濯足庵文集钞序》小议

肖亚男

卢文弨(1717-1796)一生著述甚夥。据严元照《晦庵学文》,文弨晚年曾自刊文集:“(卢文弨)垂歿之年始以《文集》付梓,未及五之一即下世。钱塘梁山舟(同书)侍讲出白金五十两,布告同人饮之,年馀刊成五十卷……其编次芟汰有不可解者。”^①而存世的《抱经堂文集》,乃卢文弨去世之后鲍廷博刊本,嘉庆二年刻讫,凡三十四卷,收文395篇,卷帙甚至少于严元照所说的梁山书刻本(但不知去向)。民国初年,张元济将此《抱经堂文集》三十四卷影印,收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。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文锦点校本即以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为底本。此本虽通行于世,却不能大体反映卢文弨的著述原貌,令人为之遗憾。因此,《抱经堂文集》的辑佚就显得十分必要。惜乎自清嘉庆以来尚无人重视此项工作,近岁以来,学者们才开始关注卢文弨的佚文,先后辑得10篇佚文^②。

近日,笔者新发现一篇《抱经堂文集》佚文《濯足庵文集钞序》,全文如下:

《濯足庵文集》者,上元张怡白云之所著也。父可大,明登莱总兵官,死孔有德之难,谥庄节,事载《明史》。怡之生也,园中鹿适亦产子,故命曰鹿徵,字瑶星。于后乃更今名。亦或以“怡”为“遗”。崇祯末年,陷贼不屈,濒死者数矣。卒乃脱归,乃筑室于摄山,以祀明徵君,曰白云祠,主其香火,而终老焉。

其著作甚多,无版行者,余来金陵五年,始从冯生荫祉所得其集,读之,文笔赡丽,有初唐人风致。其《述亡》、《惩贪》、《源逆》、《再覆》等篇,叙明之所以亡者,虽亦人人之所共知,而刻画分明,指陈详校,凄然有

①严元照:《晦庵学文》卷八《书卢抱经先生札记后》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。

②杨洪升:《卢文弨抱经堂文集佚文五篇》,《图书·情报·知识》2007年总第117期;颜建华,黄智慧:《卢文弨抱经堂集集外文辑佚——兼谈卢文弨诗文集点校、整理问题》,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11年第4期。

餘痛，于千載而下可为殷鉴，诊世者恶得而废诸？今所见文集仅三册，然尚有可删者，因为择取，得二十有六篇，钞之，为三卷。其《二十君子赞》者，乃毛羽麟角之伦，有忠义之性者也。呜呼，人之所贵于物者，以有常性也。失其常性，则直禽兽之不若矣。为此赞者，将以愧夫腴然人面者也。其言虽似愤激，然吾圣人云：“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《传》曰：“豺獭犹知报本，而况人乎？”《关雎》兴于鸟，《鹿鸣》兴于兽，圣人皆有取焉。圣人者，师万物者也。若夫众人于迹则不屑与物并，而于德则实与之习，且反有逊焉。是赞之作，盖亦本诸圣贤之意也，而可议乎哉？

余读其文，思其人，父为忠诚，己为高士，清风亮节，实足与明徵君相先后。而百年以后，白云祠遗迹又复荡为寒烟衰草而不可复寻；唯此遗墨尚留，志行隐约可睹，能使人三复低徊而慨然远慕，则其人未尝亡，其祠亦可复也。邑志载有《古镜庵诗内外集》，尚未见跋，当从人更访之。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七日，钟山书院山长、东里卢文弨。

序文存于《濯足庵文集钞》卷首，而《濯足庵文集钞》系卢文弨为张怡（1608-1695）的《濯足庵文集》所做的选本，共三卷，选录张怡文二十六篇。笔者所见到的《濯足庵文集钞》系清同治五年凌霞钞本，曾经晚清著名藏书家莫友芝之子莫绳孙收藏，钤“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印”、“景山草堂”等印，现藏于南开大学图书馆。该钞本后还附有张鉴、汪曰桢、叶廷琯等人跋语，可推知此本流传大致过程。其中张鉴跋云：“此三卷为卢学士抱经主钟山书院时所得校本……辛卯十月拾香堂主人出以示余，书以还之。”张鉴（1768-1850），字春冶，号秋水，浙江乌程（今吴兴）人。嘉庆甲子副榜贡生，授武义县教谕，博览群书，工诗善画，尤精考据之学。著有《西夏纪事本末》、《冬青馆甲集》等，《清史稿》有传。跋中“辛卯十月”当是道光十一年（1831）十月，“拾香草堂”则赵之琛和温日鉴都曾以此为号。张跋后又有汪曰桢跋云：“张瑶星《濯足庵文钞》三卷，卢抱经先生选录，向在亡友温铁华拾香草堂见之，未细读也。顷吾友吴晓钺得之，邮筒相示，始一披读其文……同治乙丑冬十月乌程汪日桢书于上海寓居之观养庐。”知此处“拾香草堂主人”指温日鉴，日鉴字铁华，一字霁华，清藏书家、金石学家、地理学家，亦乌程人；吴晓钺名钊森，字良模，号晓钺、晓镇，苏州震泽人，深研经史百家，精医术，有《复社姓氏传略补正》等。汪跋后乃叶廷琯跋云：“晓钺以此集示谢城索跋，旋即寓书赠余，盖践前年洋泾寓中之约也。……同治乙丑一阳生日吴门叶廷琯识于沪寓之海天一角楼。”谢城即汪日桢（1813-1881），史学家、诗人、数学家，字仲雍，一字刚木，号谢城，又号薪甫，乌程人。咸丰四年举人，曾修撰《乌程县志》、《南浔镇志》等。叶廷琯（1792-1869）字紫阳，号调生，江苏吴县人，潜心朴学，喜金石书画，多藏书，兼通医理，有《劫餘所见诗录》、《吹网录》等。据诸跋可知卢文弨所选《濯足庵文集钞》至清道光十一年为温日鉴所得，同治四年时则归吴钊森所有，吴寄汪日桢索

跋,又将该书寄赠叶廷琯。之后流落不得而知。而南开大学所藏钞本,并非吴钊森赠叶廷琯之原本,因上并无吴、叶等人印鉴,仅有莫绳孙印和景山草堂印,当系莫氏的过录本。同治五年六月莫友芝与汪曰桢相识,本年颇有交往(参张剑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),莫氏过录本或即成于此时。

从卢文弨《濯足庵文集钞序》可知,张怡《濯足庵文集》原本为三册,不知卷帙几何,收文几篇。《(乾隆)江南通志·艺文志》载张怡著述9种,其中包括《濯足庵文集》十二卷,或即为卢文弨所见之本。其本是否尚在人寰,不得而知。卢文弨为此书择定编目,并亲自抄录此书,尔后为之作序,序末他还表示要继续寻访张怡的另一部作品《古镜庵诗内外集》,足见对张怡的敬慕。单就序文而言,我们亦可看到,卢文弨对张怡之文的价值有相当高的评价:不仅“文笔赡丽,有初唐人风致”,而且“刻画分明,指陈详校,凄然有馀痛,于千载而下可为殷鉴”,具有政治讽谏之用,应被执政者重视。在表彰其文学价值和现实政治价值之后,序文更上一层,点化出张文的“忠义”内涵和“本诸圣贤”的根底。卢文弨为浙东余姚人,在学术渊源上属于全祖望所代表的浙东学派。他们承袭传统的儒家思想,“由理学而入于史学,故富于情感,醉心正义,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”^①。因此,即使面临文字狱的威胁,也汲汲于南明及明遗民文献的搜辑、整理。而“他们提倡天地正气,努力在同情遗民与认同清政府的统治之间取得平衡”。^②卢文弨采访张怡遗集,并撰写此序,即是乾嘉浙东史学思想和态度的生动体现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作为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影响的遗民,张怡的确值得尊重。清中期文坛领袖方苞还为之撰写《白云先生传》,盛赞张怡大节。当代学者华乐云先生为张怡撰写的传记^③则详细记述了张怡的生平始末、交游概况、为官经历、诗文成就、史学建树等。据华乐云先生考证,张怡一生的著述确实相当可观,自撰和编写的书籍至少有49种,300多卷^④,蔚为大观。另外,华乐云先生还指出,享誉天下的传奇剧《桃花扇》与张怡渊源颇深:“孔尚任为了写《桃花扇》,专门到摄山拜访张怡,有诗为证。”^⑤华先生还指出《桃花扇》中的道士张

①杜维运:《清乾嘉时代之史学与史家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89年,第72页。

②杨启樵:《论全谢山史学的精髓》,收入方祖猷、滕复主编《论浙东学术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5年,第391页。

③陈钟鸣主编:《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3年,第31-39页。

④陈钟鸣主编:《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》,第38页。

⑤陈钟鸣主编:《清代南京学术人物传》,第35页。诗指孔尚任《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》:“淙淙历冷泉,乱石路频转。久之见白云,云中吠黄犬。篱门呼始开,此时主人膳。我入拜其床,倒屣意颇善。著书充屋梁,欲读从何展。数语发精微,所得已不浅。先生忧世肠,意不在经典。埋名深山巅,穷饿极淹蹇。每夜哭风雷,鬼出神为显。说向有心人,涕泪胡能免。”

薇即以张怡为原型^①。在剧本最末的《入道》一出,道士张薇(字瑶星)喝斥了国破家亡之后重聚的侯方域和李香君:“呵呸!两个痴虫,你看国在哪里?家在哪里?君在哪里?父在哪里?偏是这点花月情根,割它不断么!”男女主人公听得“冷汗淋漓,如梦忽醒”,从而各自出家人道^②。虽然这一情节应是孔尚任的虚构,张薇这个角色的名字^③和人物形象却与张怡颇相吻合。据方苞《白云先生传》,张怡入清后屏绝世事,鲜与人往来。其他遗民尚有诗书楮墨流传人间,“先生则躬樵汲,口不言诗书,学士词人无所求取,四方冠盖往来,日至兹山,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”。方苞在传中说,自己的父亲目睹张怡室内“架上书数十百卷,皆所著经说及论述史事”,请求录副,而张怡不允,明言已决定将所著文章随自己入土,不愿流传于异代。其亡国之痛、决绝之意,于此可见一斑。所幸其子孙有所保留,其遗著未至埋没九泉。但据方苞所言,外人终究难以寓目。

综而言之,卢文弨此序表彰了张怡的清风亮节,忠贞不二,指出其德行足以与前代高士明征君(姓明,名僧绍,字承烈,南朝刘宋时为官,入齐后隐居摄山栖霞寺)比肩。而笔者通过查阅资料获悉张怡著述累累,单论卷帙几乎可与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巨擘相颉颃,毫无疑问是明末遗民群体中的荦荦大家。然而张怡著作多未刊布,仅赖手稿或钞本流传,导致后世对张怡鲜有了解。于是,卢文弨这篇佚序,不仅可以为《抱经堂文集》补遗,对于学界研究张怡以及他所代表的遗民群体,也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。除此之外,此序或许还可为乾嘉浙东学派研究添一注脚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

①丁绍仪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已经提出这一说法。见《听秋声馆词话》卷十二,清同治八年刊本。

②孔尚任:《桃花扇》,三晋出版社,2010年。

③“薇”寓伯夷叔齐“采薇”之意,与张怡的遗民身份一致;瑶星则正是张怡之字。